

蘇聯民族政策之探討

李玉珍

壹、前言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境內的民族超過一百個。蘇聯官方在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人口總調查資料中，列舉出了九十三個民族的口數，其中有廿二個民族的人口超過一百萬^①。

蘇聯的衆多民族各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例如美國學者阿姆斯壯 (John Armstrong) 就把蘇聯境內的主要民族分爲三類^②：(一)與俄羅斯人同爲斯拉夫族的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擁有與統治團體一樣的語言與文化特質，而經濟發展較俄羅斯人落後，稱之爲「小兄弟」(Younger brothers)；(二)國家民族 (State nations)，屬於此類的有波羅的海的三個民族、喬治亞人和摩爾達維亞人，他們擁有歷史的獨立性，文化與經濟的發展程度與俄羅斯人相等或甚至超過；(三)殖民地的 (Colonial)，包括同教的中亞民族、阿塞拜疆人和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亞洲民族，他們正要轉向現代化社會，而其文化傳統被視爲是現代化的障礙；在社會型態轉替時期，最可能與支配民族發生衝突。從這一分類看，蘇聯各主要民族不僅其歷史、文化的傳統不同，其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也不同，因此在組成一個聯盟形式的國家時，在客觀條件上即存有許多問題。

一九八一年蘇共召開第廿六次全體代表大會，當時的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作總結報告時即指出：「今天蘇聯各民族的團結比任何時期都堅固，但這並不是說，在民族關係範圍內的所有問題都已解決了。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有不少

註① See: SSSR V *Tsifrah v 1982 goda*, (Moscow: Finansy i statistika, 1983), pp. 13-14.

註② See: John A. Armstrong, "The Ethnic Scene in the Soviet Union", in Erich Goldhagen (e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1968), pp. 14-32.

的問題需要黨敏感的加以注意」^④。因而，正如 Richard Pipes 所說的：「民族問題在蘇聯內政上佔有獨特地位」^④。布里茲涅夫在頌揚蘇聯境內的民族「團結」時，亦不能不責令各級黨委會對潛在的民族問題予以最密切的注意。

蘇聯民族問題之值得重視，至少有下列兩個原因：

(一) 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成立都符合了下列條件：以民族名稱作為共和國名稱時，該民族須在當地人口中佔絕對多數；須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外國接壤；人口須在一百萬人以上^⑤。因此，在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都與外國接壤，及該加盟共和國的主要民族為非俄羅斯人的情況下（俄羅斯共和國除外），這些組有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及效忠如何，不僅會影響蘇聯的內部團結，且會影響及蘇聯邊境上的國防安全。

(二) 民族問題的惡化會影響及蘇聯當局下苦心塑造「蘇維埃民族」的目標。塑造這個新民族的目標在於使其境內各民族拋棄他們的文化傳統，而臣屬於社會主義文化之下。因此，民族問題的消長也可以反映出蘇聯政治社會化的成效如何。

民族問題對蘇聯內政可能產生的衝擊，當局並非是無所知，而其為確保本身安全所採取的民族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基於何種需要與考慮？這些民族政策的意義、特點及其成效如何？這些都是本文所欲討論的。

貳、民族政策的沿革

史達林曾說：「民族問題並不是始終只具有同樣的性質；民族運動的性質和任務是依據革命發展的不同時期而變更的。因此，在革命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上，革命性質和任務的變化要引起民族問題的性質和任務相應的變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政策也要依據這點而變更」^⑥。這一段話可以顯示出，蘇聯的民族政策不僅要遵守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的原則，且要因應時代的變遷，而作出相對應的修正。

俄國在「十月革命」前後，及一九二二年底成立「蘇聯」到現在的八〇年代，其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已有數度的改變，因此

註④ Pyada, Feb. 24, 1981.

註⑤ Richard Pipes, "Introduction: The Nationality Problem", in Zev Katz (ed.) *Handbook of Major Soviet Nationali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p. 1.

註⑥ See: A. I. Denisov, *Sovetskoye gosudarstvennoye pravo*, (Moscow, 1947), pp. 234-235. Cited From: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2), p. 21.

註⑦ 史達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頁三五七。

，它的民族政策也作了數度的修改。

(一)「十月革命」前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主要的民族政策是提出「民族自決權」與「區域自治」的口號。此二口號在一九一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一項決議案中即已提出^⑦。不過當時對於「民族自決權」及「區域自治」的具體作法却没有詳細的論述。倒是史達林依列寧指示在同時期所寫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中對「民族自決權」有詳細的說明：「自決權即是一個民族能按照自己願望來處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權按自治原則來安排本族生活。它有權去與其它民族建立聯邦關係。它有權完全分立出去。每個民族都有自主權，一切民族都是平權的」^⑧。關於「區域自治」的重點則是：自治區域的地理邊界，由當地居民依照經濟、生活習慣等條件來決定^⑨，而不是依照民族的不同來劃分自治區域的邊界。

此一時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所以採取這兩個口號作為它「民族政策」的重點，乃是基於當時俄國國內、外情勢的考慮。換言之，在國內藉以拉攏那些受沙皇統治壓迫的民族；在國外，則是對抗奧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八九九年所通過的民族綱領，這個綱領的主要重點是採取民族文化自治。

列寧、史達林反對民族文化自治，而主張「區域自治」與之相抗衡，雖然提出了種種理由作為說明，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民族文化自治將導致民族主義的發展，這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原則不符。這一點，也是史達林所承認的。他指出，民族文化自治驅使大家走向民族主義，「因為它硬要大家按民族標準實行『劃分』，硬要大家去『組織』民族，硬要大家去『保存』和培植『民族特點』，即硬要大家去作這種絕非社會民主黨所應作的事情」^⑩。

(二)「十月革命」後，到蘇聯的成立

「十月革命」後，列寧既已掌權，當可放手去推行其既定的民族政策，然俄國在革命成功後旋又陷入內戰，邊區的民族在「民族自決權」及「區域自治」口號的激勵下，紛紛要求實現「民族獨立」之主張。例如中亞的回教徒召開了一個全體回教徒特別

註⑦ 請參閱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列寧全集），第十九卷，頁四二六—四二八。

註⑧ 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頁四一。

註⑨ 見史達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前揭書，頁一〇二。此一報告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七次代表會議（即著名的「四月會議」）上的報告。

註⑩ 同註⑧，頁八八。

會議 (Extraordinary All-Muslim Conference)，先是要求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中有塔什干城的自治權，繼而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宣布成立土耳其斯坦自治政府 (Turkistan Autonomous Government) ⑩；又如烏克蘭民族獨立運動在「十月革命」後第十三天即已展開，他們獨立的意願從未消失，其間並組織有各種的秘密團體，展開積極的活動⑪。這些情況都使列寧無法繼續高唱「民族自決權」及「區域自治」的口號。

布爾什維克於是不再提倡「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而改為「國家分立權」，並提出「聯邦制」的政策。

關於放棄「民族自決權」的口號，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史達林曾作說明：此一口號已變成便於帝國主義者利用的空洞口號，因而改代以各民族有國家分離這個更清楚更明確的口號⑫。然實際原因却是各民族要求獨立這個事實，迫使俄共不得不改弦易轍。

而「聯邦制」原先是列寧所反對的，他在一九一三年即提出「只要各個不同的民族組成統一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者決不主張實行任何聯邦制原則，也不主張實行任何分權制」⑬。但是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却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加入了採用「聯邦制」的條文。該黨綱中說：「黨提出按蘇維埃方式組織的各國家，實行聯邦式的聯合，作為達成充分團結的過渡形式之一」⑭。

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之一是俄國的內戰。正如史達林所說的，「如果沒有富產原料、燃料和食物的邊疆地區的援助，俄國中部這個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就不能維持長久。同樣地，如果沒有比較發達的俄國中央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援助，俄國邊疆地區也必然要遭受帝國主義的奴役」⑮。前一段話是事實，後一段却不盡然。

另外影響到列寧改變主意的原因是：

(1) 俄國在內戰時期，曾有外國部隊進入俄國境內，意圖幫助邊區民族脫離俄國的控制，因此，俄共急欲使各個地區結合成一

註⑩ See: Manuel Sarkisyanz, "Russian Conquest in Central Asia", in Wayne S. Vucinich (ed.), *Russia and Asia*, (Cal: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2), p. 276. 這個自治政府在一九一八年二月間被塔什干和薩馬爾罕的紅軍支隊所消滅。

註⑪ 有關烏克蘭獨立運動的詳細情形，請參閱謝天士著，「烏克蘭人的民族獨立運動」，(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第十一期，頁七一—七五。

註⑫ 史達林，「關於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史達林全集)，第五卷，頁三四。

註⑬ 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頁二九。

註⑭ 「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黨綱摘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前揭書，頁四一七。

註⑮ 史達林，「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史達林全集)，第四卷，頁三二一。

個統一的軍事戰線^①；

(2) 俄國各地區在過去的歷史發展中已形成了一種經濟分工的形勢；

(3) 俄共本身的宗旨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國家，但是單一的國家（如沙皇政體）恐又不為其它民族所接受，故倡議各民族聯合組成的聯邦國家^②。

俄共為使聯邦制能為各民族所接受，其具體作法是：(1) 拉攏知識份子；(2) 給予各民族在參加聯邦制上的自主權，並指出將予各民族以平等對待，並幫助落後民族的文化、經濟發展。

在拉攏各地的知識份子方面，俄共要共產黨人暫時忘却其黨的意識，給予那些非黨員知識份子信任，吸收他們參加蘇維埃的工作，並吸引他們擔任工業、農業、食物等方面的職務，以期使他們逐漸蘇維埃化^③。在對其它民族的示惠上，史達林指出：俄國共產黨人民族政策的本質，是放棄對於非俄羅斯民族所居住的所有各種「要求」與「權利」，承認這些民族有獨立的國家存在之權，這些民族可同俄羅斯中央地區實行自願的軍事上和經濟上的聯盟，並將幫助落後民族的文化與經濟的發展^④。

(三) 蘇聯成立後，到二次大戰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當時加入的計有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高加索等四個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史達林在蘇聯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報告時提出保證：這個聯盟乃是各平等民族的自願聯合，每個共和國都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⑤。

二〇年代早期，俄共的民族政策先是強調「黨務」的訓練。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曾提出了一個有關的提綱，包括：成立高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班，以訓練各民族各共和國當地的黨工作人員；發展用本族語言刊行的原則性的馬克思主義讀

註① 關於同盟國軍隊進入俄國，及對俄國內戰的影響，請參閱佐爾格·萬·盧赫著，鄭學稼譯，「蘇維埃俄羅斯史」，（臺北：文星書店，民國四十八年），頁八三—八五，頁九六。

註② 更詳細的說明，請參閱史達林，「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前揭書，頁一七五—一七九。

註③ 見史達林，「蘇維埃政權對於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同前註書，頁二二八。

註④ 史達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的民族政策」，同前註書，頁一七一。

註⑤ 史達林，「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同前註書，頁一八九。

物；發展用本族語言刊行黨的羣衆性讀物；加強各共和國內黨的教育工作等等^②。

在該次代表大會中，史大林提出了要圍剿「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③。雖然圍剿的是兩種民族主義的發展趨勢，但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並沒有認真執行。在二次大戰勝利的次日，史達林下令，對於俄羅斯人在蘇聯國內所表現的領導地位應予特別重視，並稱他們爲「蘇聯境內最傑出的民族」^④，卽爲明證。然而地方民族主義却受到了致命性的打擊，因爲地方民族主義的發展足以威脅到蘇聯內部的團結^⑤。

這一時期民族政策的一個重要措施是語言政策的頒布。早先，史達林在言論上並不贊成同化政策，他在「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中寫道：「同化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庫中所絕對不容許有的，因爲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此外，大家知道，民族和民族語言是以非常的穩定性以及對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而著稱的」^⑥。他同時認爲，到達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第二階段，卽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充分地鞏固起來，而且社會主義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時，民族差別和民族語言就會自行消失，而有共同語言的出現^⑦。然而，史達林却無法等待這種民族與民族語言自行消失時刻的來到。

一九三八年三月，蘇聯通過法令，規定所有各少數民族的學校必須教授俄語。這個語言政策的目的在於：(1)減少各地方語言與俄語之間的差異；(2)使同一語系中的各民族方言逐漸分離，這樣，除了大斯拉夫主義，其它各種「大主義」(Pan-isms)就無由產生了^⑧。

(四) 二次大戰後

在一九五三—五八年，赫魯雪夫爲奪得黨中央領導權，曾刻意地討好偏遠共和國的黨幹部，這使得當地的非俄羅斯籍的黨領導人得到不少好處。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被調升至莫斯科擔任要職，同時，他們的國人在共和國中也被賦予在經濟行政上的較大自

註^② 參閱史達林，「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因素」，同前註書，頁二〇七—二〇八。

註^③ 參考同前註，頁二〇二—二〇四，及頁三二七。

註^④ See: Walter Kolarz, *op. cit.*, p. 19.

註^⑤ 這些地方民族主義的發展形式包括了：(一)聯邦主義的民族主義，卽是幾個歷史傳統類似、地理位置接近的民族聯合起來組成國家；(二)經濟的地方主義，不承認莫斯科有權干涉他們的經濟制度；(三)宗教的民族主義；(四)語言的民族主義。參閱：Walter Kolarz *op. cit.*, pp. 17-18.

註^⑥ 史達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前揭書，頁三五五。

註^⑦ 參閱同註^⑥，頁三五六。

註^⑧ Walter Kolarz, *op. cit.*, p. 18.

主權和文化政策上的較大活動餘地^㉔。

但在一九五八年中，赫魯雪夫修正他所制定的這種較自由的民族政策。在擊敗「反黨集團」，放逐朱可夫（一九五七年），並強迫布加寧辭職（一九五八年）後，赫魯雪夫認為他的地位已告穩固，而無須再取悅各共和國的黨部以爭取他們的支持。同時在一九五六年由於波蘭與匈牙利的民族覺醒運動，也使蘇聯境內非俄羅斯共和國發生普遍的不安，這都使赫魯雪夫要縮緊他的民族政策^㉕。

一般而言，在民族政策上赫魯雪夫放棄了一些史達林的作法，如集中制、強迫性的俄羅斯化政策。在貶史達林後，爲了給蘇維埃制度一個新的合法性的基礎，赫魯雪夫宣稱，雖有史達林的破壞，蘇維埃制度仍完成其歷史性的任務。他堅稱社會主義已成功地改變蘇聯一些不同民族團體的意識，從民族意識轉向了社會主義意識，而正邁向共產主義意識，結果是，民族間的差異已沒有存在的理由^㉖。

赫魯雪夫希望經由文化與社會經濟的改變來達到民族差異的消失。蘇聯領導者相信，俄語的普遍使用將可導致民族語言與民族文化的消失；而增加移民的比率和經由經濟發展帶來的城市化將可使社會結構改變，而快速地產生新社區。在這些新社區中，民族差異將是無足輕重^㉗。因此在六〇年代，蘇聯領導階層決定，教育與經濟的發展將是克服民族差異的必要與有效條件^㉘。

從七〇年代開始，民族問題的性質已從脫離中央而獨立，轉移到人口成長趨勢上。由於歐俄人口的增加率不斷下降，而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人口增加率逐年上升，布里茲涅夫在一九七六年時即呼籲要對「近來愈形惡化的一些人口問題」提出官方的人口政策^㉙。而這種人口比率的逐漸改變，將可能再度使民族意識高揚而強化民族衝突。

雖然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廿六次代表大會中央總結報告中，提出了蘇共仍將遵循列寧民族政策的原則^㉚，然而蘇聯今日社會環境已非當年「十月革命」前後的社會環境，因而在民族政策的具體辦法上也必然有所不同。

註^㉔ Yaroslav Bilinsky, "The Rulers and the Ruled",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Oct., 1967, p. 17.

註^㉕ *Ibid.*, pp. 17-18.

註^㉖ See: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Determinants and Parameters of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in Jeremy R. Azrael (e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Praeger, 1978), p. 51.

註^㉗ *Ibid.*, p. 54.

註^㉘ *Idem.*

註^㉙ See: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28, no. 8, Mar. 24, 1976, p. 27.

註^㉚ See: *Pravda*, Feb. 24, 1981.

叁、民族政策之本質

蘇共自其前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起，即有列寧、史達林提出動人、寬厚的民族政策，如讓各少數民族擁有「自決權」、「實行「區域自治」。

「十月革命」成功後，先後有民族要求實行「獨立」，因遭俄共打擊，只得取消。而在俄國過渡到組成「蘇聯」期間，各地成立的蘇維埃及共黨組織都成了打擊當地民族運動的最佳工具。一旦地方共黨勢力鞏固之後，民族運動再就無容身之地。這種情形發生在烏克蘭、白俄羅斯，亦同樣發生在中亞、高加索^②。

史達林曾強調「蘇聯」的組成完全是各民族自願的。但是，列寧同意採行「聯邦制」之時，爲要確定烏克蘭仍將受到俄羅斯的控制，曾派遣史達林前往主持烏克蘭的黨務^③。而高加索的加入聯盟也不是三個居於高加索地區的民族：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阿塞拜疆人之所願^④。

蘇聯成立後，俄共民族政策的本質開始顯露出來，以前賦與各民族的種種權利：自主權、平等權等，也漸次被剝削一空。因爲，當布爾什維克政府開始鞏固它的權力時，邊界的少數民族必然地也企圖要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但最後却在紅軍的武力下，以蘇維埃國家團結的利益爲名而撤銷。在一九二三年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二次大會上，史達林粗率的宣稱，若在自主權與工人階級鞏固其權力發生衝突時，則前者必須對後者讓步^⑤。

在史達林掌權後（一九二四年），俄共的民族政策又有大的轉變，尤其在一九二八年的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實行後，經濟計劃所要求的快速工業化強化了中央集權制；而集體農場的實行，更使許多地區的民族失去了「自主」的能力。據土耳其斯坦人拜米查·海伊特（Baymirza Hayit）所著的「廿世紀的土耳其斯坦」一書中指出，蘇聯把土耳其斯坦這個地區的土地和水源收歸國有，再予劃分，藉以牢牢控制當地的基本生產力量，使一切可能的反抗份子難以發揮作用；另外實行的集體農場制度，迫使當

註^② 關於這一段歷史與經過，請參閱·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註^③ See: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op. cit.*, p. 41.

註^④ 請參考營志宏著，「列寧史達林論民族問題」，（政大東亞所六十四年碩士論文），頁九七—九八。

註^⑤ Teresa Rakowska-Harmonstone, "The Soviet Union", in Robert G. Wirsing (ed.), *Prote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p. 118.

地農民停止種植原有的五穀，而集中生產棉花，以供應蘇聯經濟機構的需要^④，這些都使中亞民族無力反抗中央。此外，在三〇年代早期，因為反抗五年計劃的實行及民族文化政策的改變，大量的民族精英份子被消滅^⑤。

更甚者，根據赫魯雪夫在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中的秘密演說中透露，史達林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車臣和英古什民族也被放逐。車臣·遷離他們的故土。在同一時期，喀木漢自治共和國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全部巴爾卡爾人從卡巴丁·巴爾卡爾共和國的境內被遷到遙遠的地方，卡巴丁英古什共和國的名稱亦被取消；一九四四年四月，全部巴爾卡爾人從卡巴丁·巴爾卡爾共和國的境內被遷到遙遠的地方，卡巴丁·巴爾卡爾共和國改名為卡巴丁共和國^⑥。在一九四一—四六年間，蘇聯境內被集體清算的民族及其自治領土計有：日耳曼自治共和國、喀木漢自治共和國、車臣·英古什自治共和國、卡巴丁·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和卡拉其自治區^⑦。這種民族的集體迫害，與當初俄共所允諾給予的各種權利之間，差異何其大！

在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期，蘇聯當局之所以採取較緩和的民族政策，除了是赫魯雪夫為爭奪權力而示惠於各共和國外，另一個原因也是不能忽視的，即是：在經過史達林的血腥整肅後，各少數民族已無能力再對中央作實質的反抗，且在各共和國內的共黨勢力已非常穩固。

肆、民族政策的成效

蘇聯各階段民族政策的成效如何？對蘇共而言，無疑它是成功的。然而，各民族的組成聯邦體制國家，並不是民族政策實施後所造成的自然結果，而是伴隨著紅軍武力與共黨勢力的協助，才在早期使俄國免於分崩離析。

因而，在「十月革命」後及二〇年代，出現了不少的民族運動。如「十月革命」後，蘇維埃當局在哈薩克斯坦遭遇到一個強有力的哈薩克民族運動，即所謂的「阿拉虛·奧爾達」(Alash ORDA)，而哈薩克的民族主義者隨時嚷著要把俄國殖民者送回俄國本土，消滅俄國的殖民事業。但這項企圖並沒有成功，主要是哈薩克斯坦的共產黨人捍衛俄羅斯人和俄國國家利益成功所致^⑧。另外，在烏茲別克則有「巴斯馬齊運動」(Muslim Basmachi movement)，反抗蘇維埃的統治。這一運動開始於一九

註④ 引自李普思譯，〔赫魯雪夫與共產主義〕，(香港：自聯出版社，一九六三年)，頁一八八。

註⑤ See: Hélène Carrière d'Encausse, *op. cit.*, p. 50.

註⑥ 胡秋原譯註，〔赫魯雪夫秘密演說全文〕，(臺北：民主評論社，民國四十五年)，頁七四。

註⑦ 同註⑥，頁七五。

註⑧ See: Walter Kolarz, *op. cit.*, p. 263.

一九年一月，而在一九二三年遭到致命的打擊^⑤。還有，在三〇年代中期，土庫曼境內局勢非常緊張，根據蘇聯官方來源稱，一個民族主義和宗教的反抗運動發展甚速，一個土庫曼人的組織，名為「土庫曼的自由」(Turkmen Azatlygi)，似乎在從事恐怖活動。當時官方公佈，土庫曼的民族主義者和農業集體化的破壞者，得到了土庫曼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愛達可夫(Nederyby Aitakov)的保護。愛達可夫是一九三六年史達林憲法的三十個擁護者之一，當他在憲法計劃上簽名之後，即遭槍決^⑥。因此，早期的民族政策雖然維繫了俄國的統一，但却無法贏得這些民族的向心力。

時至今日，蘇聯當局仍無法真正解決境內的民族問題。據蘇聯不滿份子麥德維杰夫(Roy Medvedev)指出，造成蘇聯關係尖銳化的原因很多，他舉出了^⑦：

(1) 史達林時代延續下來的、尚未被根除或尚未被遺忘的問題，與蘇聯一些地區民族問題的尖銳化有關。雖然在史達林時期多數被遷移的民族已經回到自己的鄉土，但是這些被貶謫的民族在返回之後，並不能立即消除史達林的罪惡行徑所帶來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屈辱。……有些民族的民族權利名義上雖已全部恢復，但他們至今仍未回到自己的民族領地，因此他們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被毀壞了。

(2) 在史達林個人崇拜年代裏，所有加盟共和國的權力都遭到了嚴重破壞。同時，對不同民族採取不同態度，乃是史達林固有的特點。

(3) 多數知識份子對管理社會、國家事務和科學文化的過份的中央集權化和官僚主義的不滿，以及大批工人、職員和集體農莊莊員對甚為低下的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滿，都不可避免地加劇了這個多民族國家中民族主義情緒的進一步增長。

(4) 一些人口上的變化也激化了民族問題。在一些地廣人稀的共和國，由於對工業和農業的發展，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其它民族的移民人口迅速增加。在一些南部共和國，由於農業機械化的迅速發展，出現了農業人口過剩的現象；而要把這些人移到其它地區去，又由於民族的和社會的心理上各種原因，也很難辦到。

(5) 在一些共和國裏發生的自然的俄羅斯化過程，尤其是在語言方面（往往包括整個文化領域），產生了一系列矛盾的思潮和情緒。

註^⑤ See: Walter Kolarz, *op. cit.*, pp. 274-275.; Bernard Lewis, "The Return of Islam", in Michael Curtis (ed.), *Religion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p. 16.

註^⑥ Boris Kandidov, *Tserkov i Shpionazh (The Church and Espionage)*, (Moscow, 1938), p. 94. Cited from: Walter Kolarz, *op. cit.*, pp. 293-294.

註^⑦ 參見羅·麥德維杰夫著，史正蘇譯，「論社會主義民族」，〔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選譯〕，（海濤出版社），頁五〇—五五。

(6) 蘇聯民族問題的尖銳化同某些國際事件和形勢的變化也有關聯。

而根據學者柯拉茲 (Walter Kolarz) 的意見，蘇聯民族政策的失敗，不能完全歸咎於蘇聯政府和共產黨。由於許多因素的阻撓，使民族問題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決；而這些因素是源自俄羅斯帝國內部的各種先天條件，與任何一個政權無關。這些因素包括了：

(1) 蘇聯境內俄羅斯人與非俄羅斯人，尤其與非斯拉夫人的人數，相差過於懸殊，天然地保證了俄羅斯人的優勢；

(2) 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在地理上的分佈，幾乎遍及蘇聯全境；

(3) 許多民族由於人數過少的弱點，致使文化與政治不能得到獨立的發展^④。

但是柯拉茲認為，「史達林主義」對蘇聯民族政策的失敗仍須負起很大的責任。史達林主義的政治哲學充滿了威脅性的極權主義氣氛，使蘇聯境內各民族的文化與政治根本無法發展。而從共產主義理念本身來說，蘇維埃的民族政策確為一種失敗，因為它沒有、而且也未能在蘇聯境內建立一個民族平等的聯邦；但就其絕對的意義而言，則蘇聯的民族政策不能稱為失敗，因為它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名義之下，為俄羅斯這一個大「熔爐」加入了許多實力^⑤。

伍、未來民族政策的趨向

如前所述，由於蘇聯境內各少數民族已無力對中央政府作實質的反抗（如掀起大規模的民族運動，或要求引用憲法上每一加盟共和國均保有退出蘇聯之權），因而蘇聯的民族問題在本質上已有所改變。而未來最令蘇聯當局擔心的是各民族人口成長率的不平均發展。柯拉茲就曾指出，因為俄羅斯人在人數上多於其它民族，自然保障了它的優勢。但是這種優勢（尤其是斯拉夫人與非斯拉夫人的比數），已隨著非斯拉夫人的人口成長率遠大於斯拉夫人的人口成長率，而讓蘇聯當局擔心。

從表一可看出，蘇聯的人口在一九七〇—一九九年中，成長最快的民族是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阿塞拜疆人、哈薩克人，其成長率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甚至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反觀斯拉夫族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其人口成長率不過是百分之六點五、百分之三點九與百分之四點五。而從未來人口增加的趨勢看（見表二），這種情況仍將持續下去。

註④ See: Walter Kolarz, *op. cit.*, p. 303.

註⑤ See: *Ibid.*, pp. 303-304.

表一：蘇聯各主要民族1970—79年的人口增加率

民族團體	人口總數 (千人)		佔全蘇人口中的比率 %		人口增加率	
	1970	1979	1970	1979	1959—1970	1970—1979
俄羅斯	129,015	137,397	53.37	52.4	13.1	6.5
烏克蘭	40,753	42,347	16.86	16.2	9.4	3.9
白俄羅斯	9,052	9,463	3.74	3.6	14.4	4.5
烏茲別克	9,195	12,456	3.80	4.75	52.9	35.5
哈薩克	5,299	6,556	2.19	2.50	46.3	23.7
塔吉克	2,136	2,898	0.88	1.11	52.9	35.7
土庫曼	1,525	2,028	0.63	0.77	52.2	33.0
吉爾吉斯	1,452	1,906	0.60	0.73	49.8	31.3
阿塞拜疆	4,380	5,477	1.81	2.09	49.0	25.0
亞美尼亞	3,559	4,151	1.47	1.58	27.7	16.6
喬治亞	3,245	3,571	1.34	1.36	20.5	10.0
莫爾達維亞	2,698	2,968	1.12	1.13	21.9	10.0
立陶宛	2,665	2,851	1.10	1.09	14.6	7.0
拉脫維亞	1,430	1,439	0.59	0.55	2.1	0.6
愛沙尼亞	1,007	1,020	0.42	0.39	1.8	1.3

Source: USSR, Central Statistical Administration,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v 1970 g.*, (Moscow, Statistika, 1971), pp. 15-21; *Itogi Vsesoiuznoi Naselenina 1970 g.*, Vol. 4, (Moscow, Statistika, 1973), and USSR Central Statistical Administration, *Naselenie SSSR; Po dannym vsesoiuznoi perepisi naseleniia 1979 goda*, (Moscow: Politizdat, 1980), pp. 23-30.

Cited from: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The Soviet Union", in Robert G. Wirsing (ed.), *op. cit.*, p. 121.

明乎此，難怪布里茲涅夫要呼籲制定官方的人口政策。因此，未來民族政策的要點是解決這種不均衡的人口增加率。這種不平均的人口增加首先將影響到各民族意識的增長，其次是影響及蘇聯的經濟發展。

由於歐俄地區出生率的下降，到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已無足夠人才來替換預定退休的工業勞動力，除非蘇聯將它的工業重心向南移入半開發的各中亞共和國，或是動員這些共和國幾乎不遷移的人口到其它地區工作。但是這兩種作法的任何一種，都牽涉到高度冒險與付出重大代價^⑤。

因而，民族問題在未來又牽涉了蘇聯經濟發展的一些問題，加上蘇聯共產黨已漸走上技術官僚的路子，因此在民族政策上除了注重人口問題的解決外，必然也將更重視現實的發展，並依循重視學校教育和經濟發展等具體方案，即以「同化」作為政策的最大重心，而減輕意識型態所扮演的角色。

陸、結 論

表二：1980—2000年，蘇聯各共和國人口增加率（千人）

各共和國	年 代		
	1980	1990	2000
全 蘇 聯	9.9	7.5	5.8
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	4.7	3.4	1.7
俄羅斯共和國	6.5	2.4	0.1
白俄羅斯共和國	9.5	6.9	4.0
烏克蘭共和國	5.6	2.6	0.8
莫爾達維亞共和國	13.9	10.5	8.3
外高加索三個共和國	18.1	17.6	14.2
哈薩克共和國	19.3	17.6	14.7
中亞四個共和國	30.3	31.3	29.1

Source: Murray Feshbach and Stephen Rapawy, "Soviet Population and Manpower Trends and Policies",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Soviet Economy in a New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GPO, 1976) p. 123.

Cited from: Alfred J. DiMaio, Jr., "Contemporary Soviet Population Problems", in Helen Desfosses (ed.), *Soviet Population Policy: Conflicts and Constraint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p. 19.

這些民族不安的情緒，而是國外的反對力量會試圖利用這些不安的種籽^⑤。就長遠方面看，對蘇聯團結的最大威脅，亦即未來民族政策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亞地區人口的迅速成長。如前所說，這個問題還牽涉到經濟發展的問題。如由中亞供應歐俄地區缺乏的勞動人力，或由中央增加在中亞的工業投資以解決中亞的人力過剩，都是牽涉廣泛的解決方案。

目前的蘇聯政府似不可能再採取史達林時代的強迫民族遷徙政策，因此在安撫傳統的民族不滿情緒外，可預測的是，未來的民族政策將是範圍更廣的一套整體政策，包括人口政策、經濟發展政策，和「俄羅斯化」政策等等。

蘇聯當局的民族政策因各個不同時期的國內、外情勢而改變，而利用反反覆覆的口號，加上紅軍的武力，使共黨掌握了境內的各民族，使這些民族再無法作「脫離」蘇聯的想法。因此在鞏固政權上，蘇聯的民族政策無疑是成功的。

然就真正的內部凝聚而言，這些民族政策並沒有成功，因為它夾雜了太多的脅迫與干涉；不過，蘇聯境內的民族即使仍有民族主義的宣示，已無法對共黨的政權構成真正的威脅。蘇聯的首腦可能試圖容忍這些民族主義的壓力，方法是在文化上更加俄羅斯化，在經濟上更專門化。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共和國成爲單一生產的經濟區，它就不會鼓勵獨立。不過最讓蘇聯擔心的，並不是

註⑤ See: "101 Problems for Mr. Brezhnev", *Economist*, Mar. 19, 1977, p. 63.